



影响人类的100本书

上

*Yingxiang renlei de
100 ben shu*

李晓兵 主编

团结出版社

经典必须被阅读

——新版序

读经典、爱经典的时代，在经历了市场经济所带来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深刻变动中，在我们的精神生活和价值信念所遭遇的迷茫困惑中，正在向我们走来。

10年前，这部书出版的时候，读经典仅仅是一种奢侈，或者，是我们的一种精神理想和企求。近年来，随着全球化尤其是信息科技的飞速发展，知识的获取和传播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在大庭广众下，尤其是在电视上对经典的“高堂讲章”，以及在网络媒体上对经典的商业推广，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化复兴”的一个鲜明的象征。其结果就是：经典得到了空前的重视，但与十年前我所看到的一样，经典并没有被“阅读”。

经典必须被阅读，经典才会成为经典。正如10年前，我在本书的初版中所描绘的我与儿子读经典的愉快体会和与葛力老先生由于经典的阅读所产生的哲学体悟。

我所经历的中国现代飞速崛起、波澜壮阔的30年，在思想历程上，可以说，就是阅读经典的结果。

第一，我的学术兴趣的缘起是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大讨论，这场讨论把我甚至我们一代学人都嵌入到文化——历史——哲学的框架；这个时候的经典，主要是中西文化的名著；

第二，北大的哲学尤其是外国哲学的专业学习，使我一直保持着对叔本华、萨特、海德格尔以及柏拉图以降的人类文化传统的关注；这一阶段的经典，主要是西方哲学、政治、经济著述，尤其是那套有名的“汉译世界名著”；

第三，牛津大学的问学经历，尤其是PPE课程中对政治哲学的探讨，让我始终跟踪着罗尔斯—诺齐克学说的重大理论价值和深远社会影响；这个时期的阅读重点，是一些非常专业的、冷僻的、艰深的学术名著；

第四，近年来在哈佛大学与亨廷顿、杜维明、傅高义等文化学者的会见和讨论，使我感到文明冲突或文化力的研究会越来越重要；这个课题要

太需要一种支撑，一种原则。我们做事、做人都应当有或盼望着许许多多的原则。这些原则从哪里来？不外是两种途径：一是从前人的经验传统中来，一是从人类的理性积淀——即经典著述中来。

朱自清先生说过：经典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文化是比实用更深的东西。这也就是为什么亚当·斯密在写出《国富论》之前，就出版了他的《道德情操论》这部影响也许会更深远的文化经典。经典的意义也不同于类似“期货”之类的有可能回报的东西。经典就是经典。经典有其本身的、本体的意义。这就是文化。只有其本身有意义的、非功利的东西，才是不会使你失望的东西。在此，我想到近 20 年前在北大和几年前在英国牛津大学阅读经典的经验。当时我所学习的北大外国哲学研究所，是一个坚持以经典的阅读为重心的学术机构。陈启伟先生领读的洛克的《人类理解论》和张世英先生领读的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至今作为一种文化的底蕴，支撑着我们精神、视野，尤其是运用经验和理性去作出价值的抉择。洛克告诉我们当代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思想源流，而康德则告诫我们任何社会都不可放弃的做人的尊严和价值。牛津大学对经典的强调就更加突出了：经典的意义在根本上就在于，在外在的价值的诱惑和骚扰下，始终不要忘记人作为人的内在的尺度。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文化的力量”。它使你在获得了物质的温饱后，始终有一种精神的充实。

经典之所以叫经典，也正说明它与一般意义上的书不一样。它的最大特点是，它不是一般人能够读到，即便读到，也不容易读懂的书。每一部真正能够称之为经典的东西，都可以说是蕴涵着某种思维方式的革命和观念体系的更新，都是对传统阅读和理解习惯的一种挑战。经典于是就需要人去解读，需要人去导读。在中国和外国，都有注疏和解释之学，以利于经典的阅读和传承。今天，随着社会的分工的日益细末，中世纪到近代产生的那一代通才已经基本上销声匿迹。社会发展的需要，使得有些人出来专门为另外一些人做点阅读经典的准备工作。这种工作，对经典的普及和传播是大有裨益的。本书的工作亦在于此。几位博士，利用他们非常有限的科研间歇，苦战数月，完成了这部大作，无论是对穿梭于校园之中的莘莘学子，还是对奔波于茫茫人海的芸芸众生，都是一件极大的幸事。大家花上一两个周末，就能够了解中外古今的近百位伟大的思想家思想精华的基本轮廓。这正是一种现代人最需要的精神的、灵魂的文化快餐和文化套餐。

当然，就我自己的经验看，经典解说的目的是在于引发读者对经典本身的兴趣。而且，经典原著的魅力在很大意义上，取决于原文的魅力。如果读者能够从经典的解说中，找到对经典本身的挚爱，最后能够用最接近经典的原初文字阅读经典，那么，经典的力量就真正地会在你的精神和人

62	马歇尔	《经济学原理》(1890)	(447)
63	伯恩斯坦	《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	(458)
64	尼采	《权力意志》(1901)	(465)
65	奥本海	《奥本海国际法》(1905)	(473)
66	埃德蒙德·胡塞尔	《现象学的观念》(1907)	(480)
67	詹姆士	《实用主义》(1907)	(488)
68	沃拉斯	《政治中的人性》(1908)	(496)
69	爱因斯坦	《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1916)	(503)
70	杜威	《民主主义与教育》(1916)	(509)
71	弗洛伊德	《精神分析引论》(1917)	(515)
72	列宁	《国家与革命》(1917)	(522)
73	马克斯·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20)	(532)
74	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	(540)
75	科尔施	《马克思主义和哲学》(1923)	(548)
76	希特勒	《我的奋斗》(1925)	(554)
77	孙中山	《三民主义》(1924)	(562)
78	马丁·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1927)	(570)
79	汤因比	《历史研究》(1933)	(579)
80	凯恩斯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	(587)
81	斯大林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38)	(593)
82	毛泽东	《新民主主义论》(1940)	(599)
83	弗罗姆	《逃避自由》(1941)	(608)
84	萨特	《存在与虚无》(1943)	(615)
85	弗罗姆	《自为的人》(1947)	(623)
86	萨缪尔森、诺德豪斯	《经济学》(1948)	(630)
87	皮亚杰	《发生认识论原理》(1970)	(638)
88	戴维·伊斯顿	《政治体系——政治学状况研究》(1953)	(646)
89	维特根斯坦	《哲学研究》(1953)	(653)
90	马尔库塞	《爱欲与文明》(1955)	(661)
91	铃木大拙	《禅宗》(1956)	(670)
92	西蒙	《管理决策新科学》(1960)	(675)
93	罗伯特·达尔	《现代政治分析》(1963)	(682)
94	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968)	(689)
95	罗尔斯	《正义论》(1971)	(696)
96	丹尼尔·贝尔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76)	(704)

97	库恩	《必要的张力：科学的传统和变革论文选》(1977)	 (716)
98	邓小平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78)	 (722)
99	科尔内	《短缺经济学》(1980)	 (729)
100	托夫勒	《第三次浪潮》(1980)	 (736)

《论语》的编纂者为准，成书于何时，有不同的说法。郑玄以为“仲弓、子游、子夏等撰”。柳宗元《论语辩》以为是曾子弟子“乐正子春、子思之徒者为之尔”。“孔子弟子尝杂记其言，然而卒成其书者，曾氏之徒也。”就《论语》中提供的一些信息推断，此书不是一人一时完成，而是由孔子弟子和再传弟子们经过约80年时间的努力陆续编成的。最后成书当在公元前400年左右。

《论语》共20篇，每篇用开头二三字为题目，如《学而》篇开头为“子曰学而时习之”，即取“学而”为篇名。《为政》篇开头为“子曰为政以德”，即取“为政”为篇名，依此类此。除个别篇有个大致中心，如《学而》讲做人的根本，《八佾》、《乡党》讲礼乐制度外，多数篇章没有中心，各章之间也无内在联系。这是语录体著作的特点，以后的《孟子》一书，也仿效此种体例。

《论语》语言简约、凝练，善于用简短的词句表达深刻的意蕴，令人玩味不尽。宋代理学家程颐说：“顾自十七八谈论语，当时已晓文义，读之愈久，但觉意味深长。”《论语》中的一些词句，至今仍然具有生命力，在人民中广泛流传。如“温故而知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欲速则不达”、“三思而后行”、“任重而道远”等，这些简练的语句，表达了深刻的人生哲理，给人以启迪。当然《论语》中也有需要扬弃的糟粕，如轻视妇女的“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阳货》）之类的说教就是错误的。

《论语》的核心内容可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1. 仁学

孔子在我国历史上创立了第一个完整的伦理学体系。孔子把政治、经济等社会关系归结为伦常关系，以人伦作为人的本质。他把人与社会、国家、宗族等关系，归结为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乡党等关系，提出一系列道德规范，作为处理相应伦常关系的道德准则，同时也作为提高个人道德品质、道德风尚的准绳和进行道德评价的标准。

孔子伦理学说中起统率作用的规范是“仁”，“仁”的伦理学意义是“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爱人”即“泛爱众”，是爱一切人。爱人的道德意识着眼于人的共性，而不是个别等级的人。在奴隶制度下，把奴隶不当人，视为会说话的牲口。孔子仁者爱人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这是孔子思想体系中的积极成分。孔子用“仁”这个基本范畴把其他的道德规范统率起来，爱人的道德意识

制裁万物，使天下之人都得到利益，没有其他原因，就在于有礼义和等级名分。只有依据礼义标准建立起等级名分制度，建立起良好的社会组织，才能够在正确地认识和掌握天时运行规律的基础上，依据天时来安排四季的活动，做到制裁万物，为天下谋利，这才算实现了人职。由此，荀子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光辉命题。认为人在自然面前并不是无能为力的。人类能够认识、掌握和利用客观规律，实现“天地官而万物役”，使天地尽其职责，万物为人类造福。他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天论》）这是说，崇尚天而思慕它的恩赐，不如像畜养万物那样控制它！顺从天而歌颂它，不如掌握天时的变化规律而利用它！盼望天时而坐待天时，不如顺应季节的变化使天时为生产服务！听任万物的自然增殖，不如施展人类的智能加速万物的繁殖变化！空想役使万物，不如参与治理万物的活动并使万物得到合理的利用！敬慕万物是如何产生的，不如促进万物的成长。所以说，放弃人的努力而指望天的恩赐，那是违背事物发展的真实情况的。

对于人在自然中的地位和作用，荀子提出“能参”，“能与天地参”的思想，认为人类能够参与和配合天地化育万物。他并不是一般的承认人类具有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而是把这种能力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和范围来认识和评论，认为人的职分可以和天地相匹敌、媲美，相互配合，宣称人类具有参与、配合天地化育万物的巨大力量和伟大作用。这样，荀子不仅正确地区分和说明了天人职分的差别，同时也正确地评价了人在自然中的地位和作用。

2. 以“解蔽”为中心的认识论

在认识论上，荀子坚持唯物主义的可知论。他说：“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解蔽》）人具有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客观世界也是可以认识的。在知识和才能的来源问题上，他说：“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所以能之在人者谓之能。能有所合谓之能。”（《正名》）就是说，人具有认识客观事物的能力，人的认识与外界事物相符合叫做“智”（知识），人天生就有所能的叫本能，本能因接触外界事物有所发展，方能形成才能。在他看来，人的主观认识能力只有同外界事物相接触才能获得认识。所以，他说：“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劝学》）在这

高度的理性眼光为人类描述的第一个社会政治模式。柏拉图的设想成为后世社会制度、政治统治和国家学说的滥觞。它的许多内容不仅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产生过极其重要的影响，而且具有永久的理论价值。例如，他的分工合作原则实际上是个经济性质的标准，是所有社会构造的基础，而“哲学王”统治原则在目的和手段上被规定为谋求公共的利益，而不谋求个人的或党派的利益，因而成为政治性质的标准。

在内在逻辑上，柏拉图的“理想国”模式朝着两个方向作了充分的展开，也具有重大意义。一是大量系统的、具体的民主文化方面（从教育到艺术）的分析和评述，具有厚实的唯物主义和圆熟的操作主义倾向。二是这个模式并非是纯技术型或纯管理型的，它还有自身的价值准则和自身的精神追求，那就是不断地趋于善的目的，即以善的理念为最高的理想来生发社会伦理。在这里，尽管方案和手段都属于理想的，然而又并非是海市蜃楼式的虚幻和空洞，它是从希腊奴隶制政体衰落的客观现实中生长出来，并力图摆脱这种衰落，企求获得重建的新兴政体。

《理想国》关于政治伦理方面的分析也在许多领域发挥着参照和引导的作用。中世纪时期，许多与之有关的思想已支配性地渗透进了社会，甚至影响了教会政治。当时所流行的天国观念、赎罪观念、地狱观念都根源于柏拉图的理想国。以后古代罗马法的制定也从它那儿寻找依据。到了近代，资产阶级国家得到发育和确立，许多社会政治家在设计体制时，把眼光回注到《理想国》。英国洛克提出的分权制、代议制，法国孟德斯鸠提出的立法、行政、司法分立制约的原则等，都汲取了柏拉图国家学说的营养。

柏拉图的政治学说充分表现出了一种理想主义的色彩，在政治思想史上开“乌托邦主义”的理论先河。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等理想政治小说的产生，都曾受柏拉图政治思想的洗礼。我们所熟悉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也与柏拉图的这种乌托邦思路有着渊源关系，以致西方学术界常有人把柏拉图与圣西门、傅立叶等人相提并论。

到了现代，理想国在英国等西欧国家仍然更广泛更有持续性地被研究着。这是由于世界上各源政治力量、各类社会思潮、各种国家形态、各条发展道路相互并存着、竞争着，呈现出了非常复杂的局面，各个个体乃至整个世界都在寻找出路和前途，向国家政治学说的肇始者柏拉图求助就成为一种重要的思想选择。费尔特说：“其结果是柏拉图似乎常常在讨论我们目前所讨论的类似问题，而他的思想观念使我们感觉到生动与实际性。”^①

柏拉图的理想国寄托了早期人类美好期望的梦。当今，柏拉图被更多

① 费尔特著，吕武吉译：《柏拉图的哲学》，第155、156页。

约》在编订的过程中，祭司们按照犹太教的观点，对原始材料作了篡改、拼凑、删节、加工，致使部分史实颠倒，错误丛生，失实之处甚多。19 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史学家和圣经学者们，对《旧约》的成书时间、性质以及各卷章的可信程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特别是根据晚近圣经考古学的成果，作了大量的考证、鉴别等去伪存真的工作。他们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尽管意见分歧，但都认为《旧约》是人类文化的一份珍贵遗产，特别是根据考古发掘证实其中许多有关历史、宗教、地理方面的记载是真实的，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

《旧约全书》共 39 卷。过去，犹太人按传统将其分为律法书、先知书和圣卷三部分。现经近人研究，更科学地将其分为经书、文书、先知书和诗文集 4 个部分：

(1) 摩西五经

摩西五经又称五经或律法书。据神话传说，其作者为以色列部落领袖摩西，故名。但实际上摩西本人仅是传说中的人物，五经并不是他的作品，而是犹太教祭司以斯拉奉波斯国王亚达薛西斯之命，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主持编订的犹太律法，其中夹杂着一些古代神话、传说、歌谣和故事，它包括《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这五卷约在公元前 444 年最早纳入《圣经》。

《创世记》是记载上帝创造天地万物和人类始祖，以及伊甸乐园、洪水传说、诺亚方舟、上帝与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订立圣约等神话传说。这些内容大多取自古苏美尔人的神话和传说，并非希伯来人所独有。

《出埃及记》是记载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处境和从埃及出走，在摩西的率领下，经历 40 余年回到巴勒斯坦的情况。本卷最重要的史料是第 20 章至第 23 章，记述了希伯来人最古老的法律，其中提及大田、园艺、休耕等内容，显系巴勒斯坦进入农业社会后的产物。这几章除记有上帝通过摩西传授十诫外，还包括有民法、刑法、家族法、婚姻法、赔偿等内容，反映了以色列人私有制和奴隶制的发展，以及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如第 31 章第 2 节规定：“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他必服侍你六年，第七年他可以自由，白白地出去。”其中许多规定与《汉谟拉比法典》（公元前 18 世纪古巴比伦王国国王汉谟拉比颁布的法典，是西亚地区流传至今内容完整的第一部法典）雷同，如第 26 节规定：“人若打坏了他奴仆的或婢女的一只眼，就要因他的眼得以自由。”对自由人的伤害罪的处理原则是同态复仇，“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如伤害了奴隶则赔偿银两。

《利未记》的“利未”即祭司，故又名《祭司法典》。此卷大量篇幅是犹太教的教仪、教规、节日的有关规定，对各种祭祖以及割礼、食物禁忌、

12

〔古罗马〕卢克莱修：《物性论》（前55）

“无不能变有，有也不能变无。”

“自然永远以一物建造他物，从不让任何东西产生，除非有他物的死来作补偿。”

“任何时候任何东西对这些感官显出是什么样，他就真是那样。”

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

【作者简介】卢克莱修（约公元前99—约前55年），古罗马共和末期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诗人、无神论者和原子论学说的著名阐发者。关于他的生平，历史上没有留下任何可信的记载，据刊他是因间歇发作的精神病而服毒自杀的。

【成书背景】罗马共和末期，内外战争连绵不断，阶级斗争十分激烈，爆发了著名的斯巴达克起义，整个社会动荡不安。人们普遍感到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因而宗教迷信盛行。也有一部分人厌倦政治斗争，反对宗教迷信，追求个人内心的宁静，信奉伊壁鸠鲁的学说。卢克莱修就是其中的著名代表。

【内容介绍】《物性论》是卢克莱修用毕生精力写成的唯一著作，但在古代和中世纪，这一著作受到蒙昧主义的长期压制，直到1473年才被意大利一个人文主义者波吉奥发掘出经过中世纪保存下来的一份基本完整的手稿。《物性论》是一部长达七千多行的诗篇，它不但是出色的文学作品，而且是重要的哲学著作。在长诗中对伊壁鸠鲁的原子论学说作了最完整、最系统的叙述。全书分为六卷，分别论述了物体和虚空；自然及其规律；灵魂；感觉和情欲；天体的生灭和人类的起源以及一些异常现象的由来。

1. 对原子论的继承和发展

卢克莱修在《物性论》中，首先从“无不能变有，有也不能变无”的命题出发，论述了物质的永恒性和无限性。他说，如果从无中能够生出物

是损害这个人罢了。在所有的君主当中，新的君主由于新的国家充满了冒险，要避免残酷之名是不可能的。马基雅弗利认为，实行酷政较实行仁政能够成功。被人畏惧比受人爱戴要安全的多。因为在他看来，人们是自私自利的，是忘恩负义、容易变心的，是伪装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当你对他们有好处的时候，他们整个属于你。但是对他们不利的时候，他们就会背叛你。因此，君主如果完全信赖人们的说话而缺乏其他准备的话，他就要灭亡。同时，人们往往对冒犯一个自己爱戴的人比冒犯一个自己畏惧的人较少顾忌，因为爱戴是靠恩义这一纽带维系的，然而由于人性是恶的，在任何时候，只要对自己有利，人们便把这条纽带一刀两断。可是如果人们处于畏惧心态，他们则由于害怕受到绝对不能免除的惩罚而保持着良好的社会秩序。但是人们处于畏惧状态就有可能憎恶君主，这该如何处理呢？马基雅弗利说，最好是一个君主能做到使人畏惧而又不为人所憎恶，要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把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同时，君主必须理解如何行不义之事，这就要求君主有高超的艺术，一个君主，特别是一个新的君主，不能去做人们所认为的好人做的事情，那样会被别人认作是无能，君主要保持国家的稳定和秩序，就必须不讲仁慈，悖于人道，甚至违反神道。这就是说，君主必须有足够的精神准备，根据变化无常的命运和事情的发展来决定自己的态度，多数情况下要多施酷政，少行仁政，在事情发展所必需之时，毫不犹豫地采取恶的手法。

第八，政治家的行动包括君主的事业要能成功，必须注意时代背景，他的行为要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否则就会碰壁和失败。

马基雅弗利指出：行动符合于时代要求的国王最昌盛，行动不合乎时代的要求就会衰败。所以一个君主要想取得成功，有时需要稳健，有时候又要急进、冒险。他认为在意大利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就是时代的要求。

4. 军事思想

作为近代军事著作家，马基雅弗利在军事和战争理论方面有不少的建树，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同时，由于时代的局限，他非常崇尚暴力机器的职能，重视武力在国家中的作用。他认为一切国家立国的基础是完善的法律和精良的军队，没有一支训练有素和装备精良的军队便不可能有完备的法律，而且法律是以武力为后盾的。因此，他提出统治者任何时候都要牢牢地控制军队，否则政权是不能稳固的。他指出：君王是用祈祷还是用武力来完成他的事业呢？倘若是前者，他们总没有好结果，而且永远不能有所成就。但如果他们能够自持，能够使用武力，那就不会陷

15

〔英〕莫尔：《乌托邦》（1516）

（《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全书》）

“如果每个人有他自己的财产，幸福是不能达到的。”

“乌托邦人既不使用金钱，对于金钱就根本不会起贪心，因而也就省去了无数的烦恼！而且这就铲除了一个多么大的罪恶根源！”

“绵羊本来是那么驯服，吃一点点就满足，现在据说变成很贪婪很凶蛮，甚至要把人吃掉，把……田地、家园、城市要蹂躏完啦。”

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

【作者简介】托马斯·莫尔（1478—1535）是英国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思想家，空想社会主义的奠基人。莫尔 1478 年 2 月 7 日诞生在伦敦一个富人的家庭，他的父亲约翰·莫尔曾经担任过英国皇家高等法院的法官，是谙熟英国法律的专家。莫尔儿童时代就学于伦敦的圣安托尼学校，掌握了当时思想界的国际语言——拉丁语。1492 年莫尔进入牛津大学，在人文主义思想的熏陶下，成为著名的人文主义学者。后来，莫尔的思想逐渐超出了人文主义思想的范围，开始同情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疾苦。1494 年，莫尔根据父亲的意愿，毕业后进入律师界，很快就以为人正直而崭露头角，名声大噪。1504 年，26 岁的莫尔被选为国会议员。不久莫尔在国会中因反对英王亨利七世为公主婚礼向国会索取巨额补助款项一事，遭受政治迫害，重新返回律师界，进一步研究人文和自然科学。1510 年，莫尔被任命为伦敦市副执行官，掌管司法。莫尔出众的才华和秉公行事，赢得了伦敦市民和商人的拥戴。1515 年和 1516 年，在英国商人的一再敦请下，英王先后派莫尔到尼德兰和加来，调解英国和当地之间的商业纠纷。1518 年，亨利八世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任命莫尔为王室请愿裁判长。随后莫尔担任副财务大臣、下议院议长，并获得爵士称号。1529 年，莫尔担任大法官，成为英王下面的一位要人。1532 年，莫尔为反对亨利八世扩充王权的宗教改革，毅然辞去大法官职务。1534 年，莫尔坚决拒绝宣誓承认英王在英国教会中的最高首脑地位，遭受逮捕。法庭判处莫尔死刑，1535 年 7 月 6 日在伦敦塔监狱被处死，终年 57 岁。

活的、赶货车的、挖煤的和种地的劳动者，胼手胝足，终日辛勤劳作，但工资收入极其微薄，过着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这些人的劳动对社会来说一天也不可缺少，但丝毫得不到社会的关怀，老病交加，穷困潦倒，便是他们一生的可怜结局。在这里，莫尔提出了上层贵族靠劳动人民养活的重要思想，这是难能可贵的。

莫尔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第一次指出私有制是一切社会罪恶的根源，他对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一切私有制进行了有力抨击。他说：假使私有制度存在，假使金钱是衡量一切的标准，我以为国事的进行就不可能公正顺利，如果每个人有他自己的财产，幸福是不能达到的。当每个人可以假借法律去拼命捞钱，那就不管一个国家有多大的财富，所有的财富总是落在少数人手里，被他们分掉，其余的人就变成贫困不堪。只要私有制存在，大多数人类，并且是最优秀的人类，会永远被压在痛苦难逃的悲惨重负下。莫尔对以货币形式表现的私有财产更加深恶痛绝，他以辛辣的笔调写道：黄金从它的本身性质说是毫无用处的，现在却到处被人们看得极珍贵；本来黄金由于人才获得价值，也因为人加以使用才获得价值，可是人反不如黄金值钱。由于一小撮人拼命地猎取黄金货币，造成大多数人的贫困、饥饿。莫尔深信，一旦金钱废除，也就渐渐没有贫穷了。因此，他认为在私有制的社会里，任何改良的办法，任何局部性的改革，都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社会上的疾病，只有完全废止私有制度，建立财产公有制，财富才可以得到平均公正的分配，人类才能有福利。这种消灭私有制的思想，是莫尔空想社会主义的核心。

特别值得指出的，莫尔对封建君主专制国家和法律的本质，已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他指出，剥夺农民土地的圈地运动，是在英国专制政府对广大农民实行血腥镇压的情况下进行的。英国封建王朝对被赶出土地和家园的破产农民，不但不解决他们的工作和生计，反而颁布了一系列的血腥的法令，残酷迫害和镇压他们，把他们关进监狱或处死。莫尔向统治者质问道：你们纵民为盗，又去办盗，这不正是你们干的事吗？他揭露英国封建专制的国家和法律不过是富人压榨和奴役穷人的工具，指出：只是一伙富有者狼狈为奸，表面名义上代表国家，实则为私人利益打算。这些富有者依靠国家政权的保护，假借国家的法律，施展种种阴谋诡计，榨取一切财富，把他们从农民那里夺来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并以国家法律形式固定下来。莫尔一针见血地指出，等到富人假借国家的名义，就是说，包括了穷人的名义在内，把他们的阴谋规定成大家必须遵守的东西，这种阴谋就当成了法律。这还说得上公道吗？在这里，莫尔虽然还没有认识到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但他看到了封建君主专制的

在乌托邦，人人关心集体，大家都热心公事，留意把公家的仓库充实起来。乌托邦人追求人们的普遍幸福，提倡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他们认为，照顾个人利益，必须以公共的利益为前提，妨碍他人的快乐，以力图取得自己的快乐，这是不公平的。反之，牺牲自己的所得，以成全别人的所得，这就尽到了博爱人类、同情人类的义务。

乌托邦人主张宗教信仰自由。乌托邦法律规定，每个人自己喜欢哪一种教，就可以信从哪一种教。他们反对以某一种宗教作为国教，作为国家的统治意识形态。大多数乌托邦人信仰自然神——宇宙创造者，其实质是一种理性宗教。但乌托邦人既有信教的自由，也有不信教的自由。乌托邦法律规定，不准任何人强迫别人信教。如果强迫别人信仰某种宗教就要受到处罚，被罚去充军或做奴隶。莫尔提出这个信教自由的原则，实际上是宣布了信仰宗教是私人的事情。乌托邦人不相信经院哲学和封建迷信。莫尔写道：至于星辰的相生相克，以及用尼胶占卜吉凶的一派胡说，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过。莫尔的这些宗教观点和主张，也是对当时天主教会的神权统治和神学体系的有力批判。

乌托邦社会不存在私有制，因此就根除了国内战争的根源。乌托邦人民酷爱和平，痛恨战争。他们认为战争乃是兽性行为，由战争获得的光荣是最不光荣的。但是，他们并不是笼统地反对一切战争，而是坚持正义性的战争，反对非正义性的战争。莫尔提出了关于正义性战争的三个很有价值的观点，并主张乌托邦人坚持进行这种战争：第一，要为保卫本国领土而战。如果别国统治者起兵进攻乌托邦，乌托邦人马上用全力出境迎击，他们绝不允许别国在任何动机下进犯乌托邦国境。第二，当友邦民族遭受敌人侵略时，乌托邦人民就给予支援，协同友邦人民共同打击侵略者。第三，乌托邦人出于博爱思想，同情受暴政压迫的国家的人民，必要时，就出兵帮助他们从虐政和奴役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乌托邦人一旦进行战争，就坚决把它进行到底，直到取得胜利。

【历史影响】莫尔的《乌托邦》一书，在历史上第一次完整地描写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图景。他在社会主义史上，首次批判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罪恶，提出了以组织生产、普遍劳动为基础的公有制理想社会制度和消灭工农、城乡、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立的思想，奠定了空想社会主义的根基，为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一些可贵的思想材料。但是，由于历史时代和莫尔本人世界观的限制，在他的社会改革方案中还保留宗教和奴隶劳动等落后的东西，而且也没有提出实现理想社会的途径。尽管如此，莫尔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历史意义还是不可磨灭的。莫尔仍然不愧为空想社

16

〔德〕马丁·路德：《九十五条论纲》（1517）

“教皇不能赦免任何罪责，而只能宣布并肯定罪责已经得到了上帝的赦免。”

“惩罚教条仅是加于活人身上，对临死者不应有所惩罚。”

“向基督徒说：‘平安，平安’，实则没有平安的。”

“先知滚开去罢！那些向基督徒说：‘十字架，十字架’，而自己不肯背十字架的先知，永别了！”

“进入天堂，要靠经历许多艰难，而不靠人平安的保证。”

《改变人类命运的八大宣言》，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版

【作者简介】马丁·路德（1483—1546）是德国和欧洲最著名的宗教改革运动的领导人之一。马丁·路德出身于德国萨克森的一个小企业主家庭。1505年于爱尔福特大学毕业后成为奥古斯丁修会的修道僧。1512年成为维登堡修道院副院长，领受神学博士学位。1515年升任图林吉亚地区11座修道院的区监督，同时任维登堡大学神学教授。路德的社会政治思想除《九十五条论纲》外，还反映在他的《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书》、《教会的巴比伦之囚》和《论基督徒的自由》这三大论著中。

【成书背景】1517年3月15日罗马教皇利奥十世以修建圣彼得大教堂为名，颁行“赦罪状”，强行发售“赎罪券”，搜刮民财。他派出特使、臭名昭著的恶棍台彻尔到德国各地兜售，到处宣传赎罪券的能效说：只要买主钱币落入钱筒叮当一响，其已死家属的灵魂立即从炼狱飞升天堂。教皇用这种办法加强对德国的经济掠夺，大量的黄金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罗马教廷，引起了货币经济刚刚发达的德国各阶层的极大愤慨，此时德国在反罗马教廷的形势下，全国犹如布满了干柴，只要有一颗火星，就会立即燃起宗教改革的熊熊烈火。1517年11月1日，路德在一些同事的怂恿下，按照当时大学里神学问题辩论会的传统，在维登堡城教堂的大门上贴出了题为“关于赎罪券效能的辩论”的《九十五条论纲》。路德主观上并不想掀起强烈的社会运动，害怕违反教会的政策。但学生们则把《论纲》从拉丁文译成德文付印，人们争相购阅，两个星期传遍德国，在德国爆发了震动欧

从圣瑟威立努和圣巴斯噶的传奇来看，炼狱里的灵魂是否都愿意被赎出来，是没有人知道的，也就是不可信的。无人能确知自己的痛悔是诚实的，更无人能确知自己得了完全的赦免。诚实买赎罪票的人与诚实忏悔的人一样很稀罕。那些因持有赎罪票而自信得了救的人，将和他们的师傅永远一同被定罪。那些说教皇的赎罪票是上帝使人与自己和好的无价恩赐的人，是我们应当特别警防的。因为赎票的恩赐只及于人在告解圣礼中所加的惩罚。那些说为求获得救赎或赎罪票并不需要痛悔的人，是在宣传与基督教不相符合的道理。每一个真悔改的基督徒，即使没有赎罪票，也完全脱离了惩罚和罪责。真诚的痛悔是要去主动寻找并爱慕补赎的，而教皇滥发赎罪票的行为，却只能使人疏忽并厌恶补赎，或至少使人产生这种厌恶的倾向。教皇的赎罪票需要小心加以宣讲，免得人们误解，以为它们比其他爱的行为更为可取。其实，基督徒须知，教皇并无意将赎买赎罪票一事与慈善的行为相比。对于教皇来说，周济穷人，或贷款给缺钱的人，比赎买赎罪票好得多。因为爱的行为肯定会使爱心增长，也使一个人变得更好些，但赎罪票不能使人变好些，仅能使人多避免惩罚。基督徒须知，人若看见弟兄困苦，不予援助，反用他的钱购买赎罪票，他所得的，并不是教皇的赦免，而是上帝的愤怒。基督徒须知，他们除非有很多的余款，就应该把钱留作家庭必需的开支，绝不可浪费在购赎罪票上。基督徒须知，他们购买赎罪票，乃是出于自择，而不是出于命令。基督徒须知，教皇颁发赎罪票，渴望（因他更需要）他们为他的虔诚祈祷，甚于他们所带来的金钱。基督徒须知，他们若不信靠赎罪票，赎罪票便是有用的，但他们若因赎罪票而丧失了对上帝的敬畏心，赎罪票便是最有害的。基督徒须知，教皇若知道那些宣讲赎罪票者的榨取，他是宁愿让圣彼得堂化为灰烬，而不愿用他羊群的皮、肉和骨去从事建筑的。基督徒须知，教皇宁愿（照他的责任）把他自己的钱赐给许多被骗购买赎罪票的穷人，即使把圣彼得堂拍卖，也在所不惜。靠赎罪票得救，乃是虚空的，即教皇的代表，甚至教皇本身，用灵魂来作担保，也是如此。那些为求宣讲赎罪而叫其他教堂不得宣讲上帝之人，乃是基督和教皇的敌人。教皇颁发赎罪票所凭借的教会宝藏，在基督的子民中间，既未充分加以指定，也未被认识。圣劳伦斯说：教会的穷人便是教会的宝藏，但他如此说，乃是用当时的说法。我们很可以说，那由基督的功德所赐给教会的钥匙，便是那宝藏。因为显然要免除惩罚和那留给教皇审问的案件，只要有教皇的权柄便够。教会的真宝藏乃是上帝荣耀和恩典的神圣福音。这宝藏自然是最令人恨恶的，因为它使以前的成为以后的。反之，赎罪票的宝藏自然是最讨人喜欢的，因为它使以后的成为以前的。赎罪票，照宣讲者所说的，是最大的恩典；其实所谓“最大”，不过

读圣经取得自己的信仰，并直接与上帝打交道，根本不需要教士阶级和教会作为人与上帝的中介了。实际上，路德把国家置于教会之上，而教会是国家政权的工具。这种鲜明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倾向，为民族国家的独立发展提供了理论，反映了德意志民族的觉醒，这是很有意义的。主张建立民族宗教，大主教不再由罗马委派，而由国王委派。猛烈抨击罗马教会的罪恶，否定教皇和罗马教会的权威，主张国家至上，是路德社会政治思想的基本内容。他称罗马是一只“巨大的吸血虫”，是“无底的罪恶深渊”，而教皇是“强盗头子”，那些主教都是伪君子。因此，罗马是“撒旦的会堂”而不是圣地，教皇不是神圣的权威，僧侣不是圣人。路德称圣经为权威，信徒应直接读圣经，对其含义和解释也完全以个人的理解和判断为基础。每个信徒对圣经和宗教的信仰是自主的、自由的，任何人都无权强迫他人信教。路德主张的是以个人为本位的宗教信仰，是以宗教的外衣体现了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思想。同时把思想和信仰当作一种不可剥夺的个人权利，这就彻底地否定了教会和教皇的权威。这样一来，罗马教会的以封建等级制度为核心的教阶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教会的性质应该是教徒的结社，教士也只不过是教徒选出的公仆。路德的这种思想深刻地反映了德意志民族从教会专制下解放出来的民族主义倾向，以及资产阶级反封建的平等观念。

路德还反对教会烦琐的宗教礼节。他讽刺教皇说，在一次小小的仪式中，若比同上帝同在花费的时间相等或更长的时间，便是亏负了上帝的道。教皇的意思必然是，如果为庆祝颁发赎罪票这件最小的事，要鸣一个钟，举行简单的游行和仪式，那么为宣讲福音这件最大的事，就应鸣一百个钟，举行一百个游行和仪式了。如果教皇把现在每天只做一次的小事要子民们做一百次，即把这些赦免和特赦颁给每个信徒，那么教会所得的福岂有比这更大的呢？如果教皇现在颁发赎罪票，是为拯救灵魂，而不是为得钱，那么，以前所颁发的赎罪票既是同样有效，他为什么把它们搁置呢？对于信徒的这些论点和疑问仅用教皇特权来压服，而不用理智来解答，乃使教会和教皇受敌人耻笑，并使基督徒不愉快。所以赎罪票若是按照教皇的意旨和精神宣讲的，那么这一切疑问便都要迎刃而解，而且根本就不会发生。

路德最后说，因此那些向基督徒说“平安、平安”，实则没有平安的。先知滚开去罢！那些向基督徒说“十字架、十字架”，而自己不肯十字架的先知，永别了！基督徒应当听劝，努力跟从他们的基督经历痛苦、死亡和地狱。所以他们进入天堂，要靠经历许多艰难，而不靠人平安的保证。

【历史影响】《九十五条论纲》是德意志宗教改革家路德就赎罪券问题